

唐廷枢与天津

葛培林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都值得今人永远纪念。唐廷枢就是其中之一。

唐廷枢(1832—1892)，号景星，广东香山人。他的一生，虽然在世只有60岁，但是，他在天津办理洋务事业和民族企业却有19年，即1873年至1892年。可见，天津是他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域。他在天津参与创办了



唐廷枢

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等企业，并取得成功。这使他成为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为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煤炭业的开发利用，以及为农业和畜牧业走农场化道路的探索，付出了巨大心智与劳作，从而为促进中国近代工

业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与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的诞生,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产物、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海运事业。在这项事业中,有唐廷枢的一份贡献。

19世纪70年代,天津已发展成外国轮船客货运输的北方中心。为了打破外国轮船独霸中国海上运输的局面,改进城市对外交通,李鸿章极力在天津倡办华商轮船事业,以带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他上报朝廷,得到批准,于1872年1月17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朱其昂为总办,并拟定了章程二十条,使得招商局有章可循。天津的分局,设于靠近海河的紫竹林,另在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有分支机构。其资本共计420余万两。实行官督商办,首采股份制,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

可见,轮船招商局总局虽然在上海,但其策源地则是在天津。因为当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坐镇天津,指挥他所管辖的洋务事业。他是招商局的实际控制人。

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开办后的轮船招商局,由于亏损严重,朱其昂被迫辞职。1873年7月,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等为会办。据李鸿章在《查复招商局参案折》(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即1881年8月5日)中指出:“同治十一年,已故道员朱其昂,购买伊敦、福星、永清三船,于上海、天津各立码头,

运漕揽货。因创办之始,外洋及贸易情形未熟,船价稍贵,其用人滥而糜费多,亦所不免。次年添派道员唐廷枢、徐润会办,增置轮船码头,颇有余利。将朱其昂亏折四万余两,分年提补。”^①由此可见,唐廷枢接手轮船招商局的工作之后,经济效益也得到了提高。

接下来,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经清朝官员董俊翰向朝廷奏报,轮船招商局的经费和用人方面都有问题。对此,李鸿章在《整顿招商局事宜折》(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1877年12月29日)中指出:

九月十八日(按:公历10月24日)奉上谕,御史董俊翰奏,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须整顿一折。据称,该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因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等语。轮船招商,原以收中国之利权,必须有利无弊,方可以期久远。著李鸿章、沈葆楨通盘筹画,于该局经费权衡出入,认真整顿,毋得稍有虚靡。严论该局,不得以办公名,位置私人滥行收录。并飭令该局商总和衷办事,勿骛虚名,而鲜实济等因。钦此。^②

根据皇上的谕旨,李鸿章在呈报的奏折中,就上述指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董俊翰原折,钞给臣等阅看。适该局商总道员朱其昂、唐廷枢

^①《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58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②《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276—127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

等,在津筹办直晋赈巢粮石,臣鸿章面加考究,仍分飭津海关道黎兆棠,署江海关道刘瑞芬,密为查防,妥筹整顿之策。兹据该道等分晰查明,拟议章程前来。臣等覆加察核,如原奏置船过多一节,查招商局开办五年,已自置轮船十二号,迨收买旗昌洋行又添大小轮船十八号,旗昌船向走长江为多,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间搁。乃英商太古将装货顿银大减,一意倾跌,局船揽载价亦随减,不敷船用,以致间有停搁,实迫于事势之无如何。拟令该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配修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藉省停船看守之费。惟勿任中外流氓售去,减价相挤其现行各船内,有附届带营者,岁收马头费无几,徒分局船揽载之货。除永宁、洞庭二船已据报由局收买归入商股外,其余三船应全行辞去无庸带管。又原奏用人太滥一节,查该局专讲贸易所用,必其所习,与官场情形隔绝,应由该商总等自行选派,以一事权。臣等及各关道向无荐人之事,每遇载运漕粮时,各省容有转荐员绅,臣屡飭朱其昂等,不可碍于情面滥行收录,现在各口岸总分各局,共二十七处,需人必多在事,皆各有职守,并无隔省官员挂名。应差支领薪水之事,又原奏该局每月须赔银五、六万两等语。查该局先后置买船栈等项,计价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本仅分领各省官帑一百九十万有奇,商股七十三万零,共银二百六十余万两,尚短一百六十万两,系以浮存挪借,抵用计息不贲,遂至左支右绌,此由局本不足之故,加以太古洋行跌价倾轧,入不敷出。然每年结算官利,尚敷衍匀结,其暗中亏耗者,只有轮船一项,未曾按年折除,并不得谓每月亏赔者。又原奏各项费用严禁滥支。随时驳飭等语。查该局进项以揽载水脚为大宗,另有运漕耗米及带货二成免税办米盈余,应令此后如能将耗米照章收足,带货免税,按照税则核

计,除贴还货主外,尚余几成均归入局中专款列收,不得并入水脚开销。其采办漕米无论盈亏,悉归公局,一切巨细进款,全登公账,记载分明,不准遗漏含混。至出款约有三端,一为船用。一为局用。一为栈房船广之用。^①

李鸿章在奏折的最后处,向皇上保证云:

如此分别秉公调剂,冀得上不亏国,下不病商,根基既固,久远可期,华商应闻风而踊跃,洋商或轮诚以议和。臣等仍随时严飭该局员商总等,恪遵圣训,和衷办事,勿骛虚名,而鲜实济,勿图小利而误大局,勿畏人言而思缩手,铁执已见而昧机宜,惟以救济时艰毋负委任为念,自当日有起色矣。此折系臣鸿章主稿,合并声明,谨奏。^②

这样,一场莫须有的“罪名”,经过李鸿章向皇帝的奏折,而得到平息。

关于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概况。通过轮船招商局在天津地区的业务,也可见其发展兴旺之一斑。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一书,在这方面有精辟的总结。笔者将其引述如下,与大家共分享: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使天津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近代化运输系统。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招商局的“永清”轮装载苏漕

^{①②}《李鸿章全集》第三册,第1276—127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

9000担首航来津。从此,漕运改为沙船与轮船搭配装运,并成为政府对招商局的特殊待遇,改变了前此的传统运载方式。外国在华轮船公司虽然很早就想染指漕运,但都没有成功。据统计,招商局轮船每年承担的漕粮运量约在50万担以上,从1873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招商局所运漕粮总量为3770万石,约占这一时期漕运总量的50%。

招商局还承办了天津城市及附近地区的赈粮运输。以前,天津的赈粮运输多由民间代办。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王朝明确规定奉天米石来津者改归招商局承运。1889年因江浙秋粮歉收,京津大米短缺;1890年和1892年,京津暴雨成灾,粮价奇昂。为解决城市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由招商局负责承运赈米。

招商局在天津承揽了大量的客货运输,挽回了利权。仅1866年(同治五年)搭乘轮船离开天津的中国旅客即达1887人,而在天津上岸的中国旅客有4000人。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前,天津的客货、客座运载全为怡和、太古、旗昌等轮船公司所把持。招商局成立后,在天津专门设立了春元栈揽载行为招商局轮船揽载客货、客座。后来,经李鸿章奏准,北洋官物、文件,以及清王朝的官物均交由招商局轮船搭载。

招商局的建立和发展,还相应地推动了天津近代工业和通讯、铁路的发展。1878年(光绪四年)经李鸿章奏准,将招商局在津海、东海二关所交税款的40%,留作天津机器局经费。为加强天津与大沽间的通讯联系,1879年招商局架设了从大沽码头到紫竹林栈房的电话专线,这是中国人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话专线线路。为支持开平煤矿的发展,并满足本局的煤炭所需,1882年招商局向开平投资21万两。后来,招商局还向津唐铁路建设投标,承包了2000吨的

铁轨和道钉。^①

由上可知,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航运事业的进步,带动了经济建设的快速提升。这是在李鸿章的总体领导下,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符合了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但是,唐廷枢作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为其业务领域的开拓、增资建设,费尽了心智,积极劳作。其成果的取得,自然有他的一份。

二、创办开平煤矿

开平矿务局是清末官督商办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其办公机关开平矿务局大楼在天津英租界 20 号路(今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与大沽路交口处)。矿区在直隶(今河北)滦县开平镇西南。

1876 年(光绪二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事宜,前往勘察。据 1876 年 11 月 24 日,唐廷枢上李鸿章的报告中云:“窃职道廷枢荷承伯中堂(按:李鸿章)面谕,驰赴开平查看煤铁矿情形。当于月之十九日乘坐小轮船,由大沽而至北塘口进发。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连日在开平一带,东三十里至古冶,西南十五里至唐山,北二十里至风山,逐日将煤井铁石细看,似有把握。”^②可见,通过实地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开采。

于是,在 1877 年,李鸿章指定唐廷枢主持开平煤矿的开采工

①《近代天津城市史》第 234 页。罗澍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

②《唐廷枢年谱》,见《唐廷枢研究》第 189、191 页。汪敬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版。



1912年,开平矿务局与滦州矿务局合并,组成开滦矿务局。图为1921年建成的开滦矿务局大楼(今泰安道5号)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署

作,并增派前天津海关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同时,拟定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对此,1877年9月27日,唐廷枢在禀呈李鸿章的报告中指出:“拟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拟集资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纹一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定于注册之日先收银十两,光绪四年正月再收四十两,以便购办机器。其余五十两,限四年五月收清。将来生意兴旺,或需添机器,或另开煤井,准再招新股二十万两,合足一百万两。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①

这样,1878年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其对外名称为中国

机矿公司,雇用了9名英国矿师和工头,在柏内特矿师的监督下,使用了英国最好的采煤机器,总工程师为英国人金达。该矿于1881

^①《唐廷枢年谱》,见《唐廷枢研究》第189、191页。汪敬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年全面投产,雇工三千人。1882年产煤三万八千吨,到1898年增至七十三万吨。该矿历年扩充设备,改善运输条件。1888年10月,津唐铁路全线通车,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除拥有连接铁路干线的支线和专供运煤的运河以及自备的数艘煤轮外,在塘沽、天津、上海、牛庄等港口,还设有专用码头。到十九世纪末,全矿总资产已近六百万两,约为资本的五倍。

另外,为了促进开平煤矿发展,1891年,唐廷枢与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设局,购地、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煤。对此,1913年郑观应在《致天津翼之五弟书》中忆述:“昔年经理开平粤局,兄与开平矿局李君玉衡、唐君景星共出资本银三万两,除买广州城南地基六十九亩并升科涨滩一百亩,约共银一万五千两,现值价银二百四十余万两。为经理人开平矿局张督办等疏忽,十余年不纳税,以致违例,竟被充公。使合股者皆失大利。每股银五千两,应失去利银约三十余万两,所得回者不过二十分之一。益知大富由天不由人算也。”^①另据郑观应在《广州城南地基公司股东说帖》中指出:“窃于前清光绪十五年开平煤矿局总办唐景星、会办徐雨之(引者按:指徐润)推广煤局分设广州,由刘吉六引购城南林桐芳沿河坦地,合建商场兼栈、房码头之用,爰组织公司集股合买各事均归开平局经理。计开平局认股一万两,李玉衡、唐纬经堂即唐景星、郑合德堂、徐雨之等各认股五千两,计共股本银三万两,名曰广州城南地基公司。嗣因徐雨之退股,唐景认足一万元,即交广平银七千二百两,李玉衡、郑合德堂各交银五千两,开平矿局交银一万两,共计交股银二万七千二百两,当经开平粤局照收入账,详报开平总局在册。随

^①《郑观应集》下册,第1184页。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又买林桐芳地六十二亩、官地七亩，地价及印契、升科相连涨滩百亩之外，尚余银八千余两留为填筑滩地等用。”^①可见，在广州设立的开平矿务局分局是有一定规模的。

同时，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担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此据郑观应在《禀谢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总办开平煤矿粤局》中指出：

窃职道（引者按：郑观应自称）于三月初十日（引者按：1891年4月18日）奉到宪札：“据总办开平矿务局唐道（引者按：指唐廷枢）禀称：‘郑道官应前蒙委办电报、轮船两局事务有年，颇著勤劳，生意日旺，已收实效，为中外商情所信服；至机器织布局因公受累之款概已筹垫清还，已由总办织布局马道建忠禀蒙恩准销案。今职道（引者按：此处的职道是唐廷枢自称）在粤与该道面晤，每谈身受中堂（引者按：指李鸿章）栽培，感激不胜，其报效之忱，时刻在抱。惟开办伊始，所以择地立厂、建筑轮船码头、照料销售各事件兼顾维艰，素知该道办事勤慎，公正廉明，并熟悉中外商情，于地方亦甚相宜，拟托该道代为经理。但在籍人员办理本地事务难免招忌，若非奉有明文委派，恐致呼应不灵，可否仰恳恩施赏给该道委札，以专责成之处，俾该道亦免鞭长莫及之虑’等情到本大臣，据此，除批飭该局准在粤择地立厂、建筑码头、运煤销售等事外，合行札委，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妥慎办理，仍将到局日期报查。”等因奉此。伏念职道识短才疏，前办机器织布局失于慎重，押款过多，法越之役，银根骤紧，势迫赔垫，免累多人，此是咎由自取，理应闭门思过。今复

^①《郑观应集》下册，第1276—1279页。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蒙中堂逾格成全,敢不力图报称,弥盖前愆。^①

接着,郑观应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后,并向其报告称:“查该局建筑轮船码头、栈房,须择水深利便商民之地,载煤来,揽货去,轻其成本,庶煤焦易销。惟事皆创始难免招忌,自当遇事与唐道函商,妥慎办理,勉益加勉,以期无负委任耳。”^②

总之,开平煤矿的成功之道,除了人尽其才之外,笔者在此借用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总结为:

唐廷枢十分注意保持开平矿的商业性质和加强成本核算。唐廷枢认为,开平矿名义上为官督商办,实质上是由商人经营管理,一切均照“买卖章规”,投资1万两的股东便可派一人到矿局司事,使大股东有权对矿山实施管理,以增加投资者的安全感和积极性。同时,产品运到天津,一律照市场价格,供给机器局和招商局轮船使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城市对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实行超经济强制性剥夺的惯例。此外,唐廷枢还对当时天津煤炭市场的价格构成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已经注意到了劳动力价格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并把中英两国劳动力价格作了比较,指出每吨煤的价格构成,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工廉价省,开采必获大利。这些都是符合近代工业发展原则的。

唐廷枢还注意到了企业发展与政府支持的关系。经过唐廷枢的争取,从1881年(光绪七年)起,清政府对开平矿援台湾基隆矿

^{①②}《郑观应集》下册,第1276—1279页。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例,实行减税方针,即由每吨的 0.672 两降为 0.11 两。大幅度的减税,有利于开平矿投入市场竞争。竞争的胜利,无疑有利于中国城市市场的发展。^①

三、与他人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

当年的汉沽、塘沽地区有不少滩涂、荒地,闲置起来就是浪费资源。为了开垦滩涂、荒地,1881 年,唐廷枢与郑观应、徐润等合办了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对此,据《郑观应自述》云:“年三十九,与唐君景星等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②另据郑观应《致唐少村中丞请移民开垦书》中指出:“忆昔年令叔景星见天津沽塘荒地甚多,与官应集资六万五千两,并开平矿局出资六万五千两,合买沽塘荒地四千顷,为开垦、种植、牧畜等用。官应曾入股银三千两。惜景星故后,张燕谋(按:张翼)等办理不善耳。”^③唐少村即唐绍仪也。

关于天津沽塘耕种公司的经济情况,郑观应在《天津沽塘耕种公司股东报告开平矿局欲吞没节略》中指出:“前清光绪七年(按:1881 年)由开平矿务总办唐君廷枢设立普惠堂,邀集官应等在宁河县新河地方创办沽塘种植公司,与开平局合股开办,由矿局代理。有前清户部直督奏案、咨札、禀批,官应等投税升科全案可查,开平局账可据。该局第一、二届账略内载:另招亲友纠一公司,购地开

①《近代天津城市史》第 230 页。罗澍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

②《郑观应集》下册,第 501 页。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

③《郑观应集》下册,第 993 页。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

垦,计本银十三万两,开平局认作一半。又载沽塘公司一款,系合本开垦之资,足为官应等与开平局合办之铁证。”该公司“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禾,事半功倍”。^①

这是在天津诞生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农场。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比张謇于1901年在南通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早了20年。由此可见,唐廷枢与郑观应、徐润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农业走向机械化、农场化的道路,做出了示范作用。今天看来,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四、结束语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病逝于天津开平矿务局。对此,郑观应写了一首《挽唐景星观察》的诗:

绝人才识济时心,
新法旁参用意深。
万里风云腾骥足,
一时声誉满鸡林。
闽疆独挫天骄气,
象译全通海国音。
商务肇兴功不泯,
凄凉身后费沉吟。^②

①《唐廷枢年谱》,见《唐廷枢研究》第202、203页。汪敬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②《郑观应集》下册,第1276页。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唐廷枢作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参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等企业。这些都是中国民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为近代新式企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刊于《天津政协》，2013年第8期，第55—58页）